

晋商曾在中国创造500年辉煌 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? (下)

1927年,山西省教育委员会颁布的《高小商业课本》第一册设置的第三课《太谷》就描述了这样的繁荣:“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。在全省商业界势力,可城在左右全省金融,以批内商号比,又多为批发庄,它的支庄遍布全国。”美国罗氏姐妹的《宋氏三姐妹》一书对此也有所记载:“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这里,所以这里常被称为‘中国的华尔街’。”

中新社记者:晋商通过何种商业模式与治理方式在经济中站稳脚跟?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?

范浩里:晋商数百年的兴衰成败,是中华民族书写了一部独特的营商文化史。他们在道德信仰、产权制度、经营谋略、管理智慧、组织体制、人本激励和市场信用中,打造出晋商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与人文精神谱系。

一是“商儒并重”的文化底蕴。晋商在数百年的商业实践中,以商与儒的衷衷共济,打破封建传统习惯,把商的生产、流通、消费形态及社会价值创造过程,与儒家文化道德人格诉求完美结合,营造了商儒并重的社会氛围和士商才的价值取向,诠释了“商

儒”的内在规律与辩证关系。

二是“义利谐调”的经营思想。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帮,能在历史进程中矢志不渝地从事贸易活动数百年,其核心就在于“义”和“利”的衷衷共济,把“以义制利、以利弘义”的逻辑力量,运用于行商济天下的商业实践,开创了晋商修身立业的道德范式。

三是“劳资共创”的发展机制。晋商开创的以“身股”与“银股”为核心的“顶生意”制度,是一种“劳合”与“资合”共创共享的资本组织形式和利益共同体模式。这种产权制度安排,成功地打造了晋商“劳资共创”的文化特质和发展机制。

四是“家国兼济”的责任担当。晋商发轫与发展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。作为民族资本的基层力量,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重仁义、行大道、舍利积德、行商济世。诸如晚清时期山西的“抗英保矿”运动,就是由晋商渠本翘、刘笃敬、崔廷献、常旭春等一大批商界精英组织发动,商、学、民全面参与的反帝保矿斗争。他们以大商视野与家国情怀奔走呼号十余年,不仅筹资数百万两白银夺回矿权,而且投资创办了清末山西首批采矿企

业、冶铁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。

“晋商精神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之一,处在深化改革转型关键时期,应借鉴晋商的“义利观”,破除创业“富不过三代”的传统周期律;应借鉴晋商的“劳资观”,创造转型期的激励方法和兼容模式;应借鉴晋商的“财货观”,揭示和深化产业链竞争的商业伦理和市场逻辑;应借鉴晋商的“家国观”,激发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。

中新社记者:晋商如何打开国际市场?如何看待晋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?

范浩里:国家的发展环境与政策导向、产业的资源配置与转换效率、商人的战略眼光与经营才能,是明清时代晋商打开国际市场的三大动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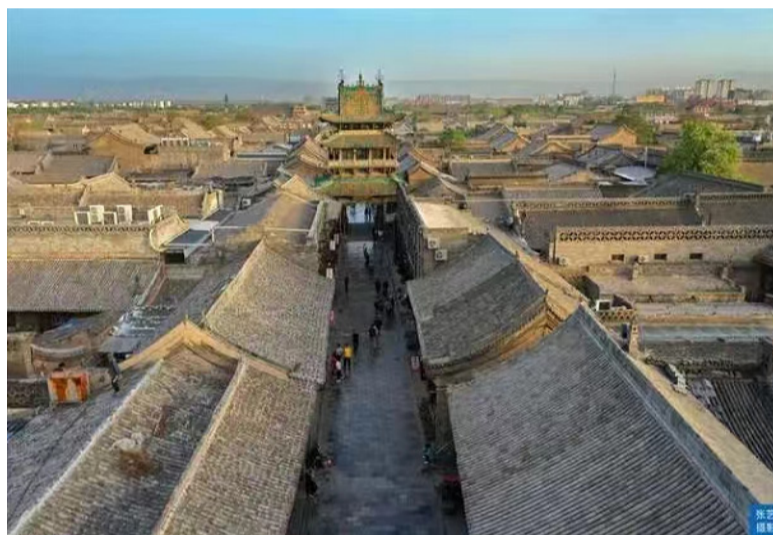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学者严慎修在《晋商盛衰记》中写道:“南则江汉之流域,以至桂粤;北则满洲、内外蒙古,以至俄国莫斯科、徐州;西则宁夏、青海、乌里雅苏台等处,几无不有晋商。”在被称为“世道动脉”的万里茶道上,晋商与陕商、京商、口商及蒙商、俄商、欧美商,共同掀起一场东西文明的大

碰撞、大交流与大融合。

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集群一直把市场扩展到俄罗斯的中心腹地,商号开到了库伦(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)、伊尔库茨克、赤塔等地,将万里茶路又延伸了1300多

公里。中俄茶贸交易量也从乾隆年的83万卢布增至道光年的1240万卢布。随着晋商车帮、船帮及驼帮走向国门、走向世界,晋商也为东西方经济交往、文化交流等作出巨大贡献。(完)

中新网



来源:视觉中国



山西平遥古城外,身着古装的演员饰演清末商人。韦亮 摄